

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研究

刘中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研究

刘中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研究/刘中猛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1

ISBN 978 - 7 - 5426 - 5374 - 1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报纸—新闻工作者—研究—江苏省—近代 IV. ①K81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501 号

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研究

著 者 / 刘中猛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1.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374 - 1/K · 352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导 言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报人产生于晚清外人在华创办的报馆,随着一些士子佣书西人而出现,为清末新兴的一种职业。19世纪60年代后,江苏省报业获得较快发展,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①为苏省士子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苏籍报人亦成为我国近代报人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通过梳理清末民初江苏籍报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还原该群体职业生存状态,分析其一面以报刊为谋生手段,另一面借助报刊平台,构建公共舆论,在社会变革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及探索强国富民道路上的选择和作为。

一、选题意义及依据

本书以清末民初苏籍报人为选题,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虑:

其一,苏籍报人是清末民初报人群体重要组成部分。道光三十年(1850年)8月3日,江苏第一份近代报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于上海创刊。由此,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成为近代报刊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粗略统计,截至1911年,各地所办中文报刊数量前六位的是:上海(459种)、广东(162种)、北京(161种)、浙江(80种)、湖北(71种)、江苏

^①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0页。

(70种)。^① 如果考虑到民初上海尚未从江苏划出,将沪苏两地合并计算的话,那么清末民初江苏出版的报刊无疑遥居首位。特别是上海开埠后,日益发展成全国商业和贸易中心,促进了新闻报业的发展。从1860年到1895年,上海新办报刊(含更名者)达86种之多,差不多占同期全国新办报刊总数的二分之一,中外文报刊都十分兴盛。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

上海开埠后,随着西学的传播,江南士林从业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效力于洋务企业,应聘西人机构,尝试新的职业。^② 清末民初苏省(尤其是上海地区)报业的繁荣,给江浙士子创造了新的就业契机,促动了一批士子投身报业,催生了数量可观的报人群体。早在外人在华开办报馆之际,苏籍王韬、沈毓桂、蔡尔康、黄协坝、李杕、伍廷旭与范祎等士子就入职外人报馆,佣书西人,襄办报务。1874年1月5日,基于“主笔之士虽系华人,但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蔽,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的认识^③,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了苏籍士子乃至国人自办报刊的先河。此后,创办或参与编辑报刊的苏籍士子不断增多,除在江苏省内以外,北京、武汉、广东等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江苏传统文化教育发达,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108年间,在所中156名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中,江苏籍达66人,占42.30%。步入近代以后,江苏教育仍保持着领先全国之势。1909年全省各类学堂

① 据《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出版地点分列表兼索引》,载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2—449页,统计所得。

② 夏俊霞:《上海开埠与江南士林新的从业观》,《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③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引自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达2074所,学生数达75460人,位居全国前列。^① 领先国内的文化教育水平,士子、学生等构成的庞大的阅读人群,以及上海作为全国新闻中心地位,使江苏成为近代中国报业最为发达的省份,也因此吸纳了一批苏省士人投身报刊业。以地域而论,苏省报人无疑是近代规模最大的报人群体。基于此,本书以清末民初的苏省报人群体为对象,通过考察近代江苏报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及其职业生存状态,揭示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参与和作为,以有助于对这一社会群体的进一步认识。

其二,报人为考察清末民初社会变动的重要视角。近代意义上的报人是一个全新的职业。早期投身外报的报人,往往为社会舆论与正统士人讥讽与不齿,“当时,一般报社主笔、访员均为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亦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左宗棠亦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的评论^②。直到甲午战争后,泱泱大国为“蕞尔小国”所败,深深刺痛了国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以康梁为首的“有志之士,既绝望于朝廷,乃举其积虑,诉诸民众”^③,他们著书立述,创办报刊,设立学会,疾呼变法图强,中国出现第一次办报高潮,报刊作用也为社会逐渐认同。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发《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认为报刊有“去塞”之效,而“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同时报刊亦“日趋平民化”、“日趋艺术化”及“日趋世界化”^④,社会影响不断增强。报人职业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也日益加深,同业组织也逐渐浮出。1905年3月,上海《时报》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首倡成立全国性的记者同盟。翌年,天津

① 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02页。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09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

④ 同上书,第291页。

报馆俱乐部率先成立。随后,上海日报公会、汉口报界总发行所、广州报界公会与北京报界公会相继成立。1910年9月,藉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之际,在上海日报会主持下,中国报界俱进会正式成立。此类团体和组织在清末的出现,表明报刊已成为一项特定的社会事业,报人亦成为特定的社会职业群体,彰显了报刊与报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报人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过程,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近代报人的生存境遇,为我们探讨近代社会变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报人也因此成为值得观察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群体。

清末民初的苏籍报人或来源于旧式士人,或为接受了西学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其言论与行为方式也同时兼有二者的特征,既保留了旧式士人的风习,也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向往。在一定意义上,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体现出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典型特征。由此,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也为我们探讨近代知识群体社会角色转换与思想观念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本。

其三,报人为考量清末民初公共领域的重要切入点。一些学者指出,在从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过程中,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与文化领域皆日益丧失中心地位,逐渐被社会边缘化。^① 近代知识分子与士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参政与议政”,士同时拥有参政议政之权,议政是参政的一部分,而知识分子却只有议政之权了,相较于士已渐趋边缘化。^② 这些认识表明传统士人在近代社会角色的转变,不仅牵动自身的命运,也关涉到社会体制性的变动。在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压倒性的时代主题后,苏籍报人既秉承古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又受到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影响,创办或参加报刊

①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3—173页。

②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编辑,议政论政,构建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在思想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张灏先生认为,在1895年至1920年初的转型时代,“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的启端”和“舆论或公共舆论的展开”,晚清以降,“报纸杂志,学会与学校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三种制度媒介所造成的舆论代表公共领域由台后移到台前,在转型时代社会正式登场。”^①在近代中国的变革背景下,报刊报人与同由知识人群担当的新式学堂、学会组织一起,构建了新型的公共领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象征。因此,考察报人群体的活动,也是我们认识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视角。

就近代不同地域的风气开化而言,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显然处于领先地位。许纪霖认为近代只有上海才具备形成公共领域的条件。^②苏籍报人很大一部分活跃在上海,与他域报人相比较,近沪的地理优势,使他们较早地接触西学,与外界交往频繁,视界开阔。在知识群体被整体边缘化之际,他们投身报业,在传统士人人世精神与近代知识分子品格追求的共同引导下,独立于权力系统和政治体制之外,以报刊为主要媒质,构建公共舆论平台,抨击时弊,倡言改革,权衡不同政治方案的得失,探索救国富民的道路,试图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体现了“社会的良心”。在清末民初的苏籍报人中,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国人自办的首份报纸《循环日报》,讽喻时弊,议政论政,对晚清公共领域进行了探索性开拓。继之而起的裘廷梁和彭翼仲等人,则倡言政治和社会改良,陈去病、徐血儿、汪东、高天梅

① 张灏:《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载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112页。

②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和秦毓鎏等直言清廷腐败,宣传反满革命。高太痴、李伯元、毕倚虹、包天笑、贡少芹、李涵秋、王蕴章和周瘦鹃等创办文艺刊物,以隐喻、讽政的方式批判时政,等等,这些言论活动与苏籍报人创办学校、参与教育、联合群体、组织社团等等一起,共同构成了苏籍报人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其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特殊角色也因此得以彰显。

其四,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苏籍报人还引领了城市消费文化的风潮。清末民初的苏籍报人,大多带有传统文士的做派和风格,除了为社会建言外,在畸形繁华的都市,他们也忘情投入各种自我消遣与娱乐,流连于茶楼酒肆,热衷于麻将游戏,乃至开花榜,评女色亦成为其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文人式的自娱活动,既构成了报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也因其对其他社会人群的某种示范和导引作用,参与了都市社会生活风尚的塑造。与此同时,为了开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娱乐大众,苏籍报人也大量进行了文化娱乐产品的生产,创办各类小报,编写刊载小说,在讽喻现实的同时,游戏人生,为社会大众提供娱乐。在一定意义上,苏籍报人的这些活动,使他们成为近代都市消费文化的重要创造者。

总之,在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报人作为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报刊业冠于全国的江苏,报人的活跃程度更胜于他处。本书在梳理苏籍报人群体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尝试分析其职业角色,并从不同角度对苏籍报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其多元面相,以有助于近代报人群体的研究。

那么本书中苏籍和报人究竟含义如何?

苏籍指江苏省籍贯。江苏建省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是年析江南省为江苏和安徽两省。乾隆二十年(1755年)江苏省分治,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府,江宁布政使司治江宁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省设江宁、常州、苏州、松江、镇江、淮安、扬州和徐州8府,通州、海州和太仓3个直隶州和海门直隶厅,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民国建立后,1912年实行省县两级制,江苏省置60县。

1914年,改行省道县三级,江苏省设金陵、沪海、苏常、淮扬和徐海五道。1927年,又恢复省县两级制,同年设南京特别市和上海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因此,本书中江苏包括今江苏省和上海市行政区,苏南指江苏长江以南地区,苏北指长江以北地区,但不包括江宁府所辖范围。

我国报纸一义起源于《春秋》,^①所谓“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在古代有邸报、杂报、朝报、小报、边报、京报、塘报和良乡报等多种形式,主要内容是官方诏令奏章、官员任免升迁,读者群则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②近代之后,始为“以报告新闻为主体,而附载评论广告,定期为公众刊行之印刷物”。^③

我国古代与报业活动有关的从业者称谓繁杂,有“报房”、“报房贾儿”、“报子”、“报贩”、“抄报的”和“报事的”等。先秦时期报人虽已作为一个合成词出现,其意为报答或报复、报仇他人,前者如有所谓“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皇生大纪》卷75)和“吾固无以报人,岂可常有愧乎?”(《梁书·刘歊传》)之说,后者如“且夫无报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报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绎史》卷96下)。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三民书店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61页。胡仲持在《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中也说:《春秋》记载了列国政治社会情况,已显现出新闻纸的意味(上海三联书店,1937年,第10页)。邵介持相反观点,认为虽《春秋》“断烂朝报”与后世报纸近似,但因其只是追记过去故事的“良史”,故不能称为报(邵介:《中国报史述略》,福建中央日报社,1937年,第3—4页)。

② 一般认为邸报产生于唐代,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是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收藏,发行于887年的邸报(参见汝信主编:《简明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19页),然曾虚白《中国新闻史》、邵介《中国报史述略》认为邸报汉代就已出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也有汉昭帝时“已有‘邸报’传知朝政之事,特史书未明言之耳”的话语。

③ 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上海复旦新闻学会,1931年,第2页。

近代报业出现后,报人才成为行业从业人员常见的一种称谓,然对报人至今尚无统一的科学定义。近代著名报人、宜兴籍徐铸成在《报人张季鸾传》中以为报人应具备史家的素质、古代士的品格,他说:“报人这个称谓,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该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特点罢”。^①程丽红将报人界定为“报业活动产生以来,以办报为生或者以报业为主要事业舞台。并对报业具有独立的创见与贡献的人物”。^②

本书报人指从事报刊创办、编辑和新闻采访等报业活动的人员,苏籍报人则指主办或主持报纸杂志,或从事报刊编辑、撰稿及新闻记者工作的江苏籍士人或知识分子,不包括从事报刊发行、销售的从业人员。他们活动舞台不一定在江苏地区,也包括省外从事此职业的苏籍士子或知识分子。书中论及的新知识分子指有新学背景的近代知识分子,其来源有三: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戊戌时期及以后清政府所办各类学校,留学教育和接受新学熏陶的士人。

本书研究时间下限民初沿袭了学界习惯用法,截至1919年,为了叙述的完整性,个别地方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

二、学术史回顾

近代中国报业的研究,主要分为报刊史和报人研究两大类。前

^①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页。

^②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页。

者侧重于梳理近代报刊的发展脉络,如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①、王东全《中国近代的报刊》^②,分早期报刊、外人报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阶段、高涨时期和辛亥前后、民国初年和北洋政府初期等时期,介绍了近代报刊的发展概况。赵晓兰和吴潮所著《传教士中文报刊史》^③分不同时期介绍了传教士创办的诸多中文报刊。美国学者白瑞华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800—1912)》^④分十一章对本土报刊、万国公报、西方报刊、王韬和香港公报、《申报》、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等方面介绍了中国近代报业情况。刘人锋的《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⑤以时间为序,研究了我国妇女报刊产生、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初期、五四时期、抗战前、抗战期间、改革开放前和 90 年代中期以来等历史阶段妇女报刊情况。

江苏报刊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编辑史和出版史领域,倪波和穆纬铭《江苏报刊编辑史》^⑥叙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江苏报刊编辑情况,包括报刊情况简介和编辑思想等,还兼及一些报刊个案,如《时报》、上海《民国日报》与它的副刊《觉悟》的编辑特色的分析与研究,戈公振等报人报刊编辑思想的研究。张宪文、穆纬铭在《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⑦中,从图书结构、装帧艺术、编辑业务、印刷技术及有影响的图书期刊图书出版与社会思潮等方面,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江苏图书出版概况。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⑧梳理了上海近代报纸的诞生、维新报刊、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小报和租界报刊等史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② 王东全:《中国近代的报刊》,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③ 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④ [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书原名: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 - 1912*。

⑤ 刘人锋:《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⑥ 倪波、穆纬铭:《江苏报刊编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⑦ 张宪文、穆纬铭:《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⑧ 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实。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①介绍了不同类别的近代上海报刊,如诗刊、艺术刊物、妇女刊物等。

近年来,对报刊的个案研究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之一,如岳谦厚、段彪瑞编著《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②,以该报所刊消息研究了1902年天津霍乱、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等20世纪初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③,考察了《大公报》在政治参与、启蒙民智等方面的贡献,并探讨了近代的社会性别、宗教和信仰习俗、防疫和赈灾等问题。李磊的《〈述报研究〉——对近代国人第一批自办报刊的个案研究》^④研究了《述报》的言论、新闻思想及其对中法战争和西学的报道。小报史是报刊史有机的组成部分,孟兆臣的《中国近代小报史》^⑤较全面概述了南北小报的编辑出版情况,也包括小报报人和小说家的简况。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⑥从小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特征、小报与上海、小报与小报文学三个角度介绍了近代上海小报发展情况。

有关近代新闻史的研究,也较多地涉及了此期报刊发展概况。方晓虹《中国新闻史》^⑦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的情况,涉及《万国公报》、《时务报》、《大公报》、《时报》和《民报》等一些重要报刊,及梁启超、狄葆贤、英敛之、黄远生和邵飘萍等近代报界闻人。中国新闻史方面的论著还有赖光临、方汉奇、杨师群各著有一部《中国

① 曹正文、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岳谦厚、段彪瑞:《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③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李磊:《〈述报研究〉——对近代国人第一批自办报刊的个案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⑥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⑦ 方晓虹:《中国新闻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新闻传播史》^①,曾虚白、李瞻、许正林等各著有《中国新闻史》^②,其他以中国新闻史为核心字眼的著述还有很多,这些专著都按时间顺序,介绍了各历史时期报刊编辑和新闻传播概况。上海新闻史主要有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③,述介了报纸的始创、宪政运动、民族革命、洪宪时期、欧战时期、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国民革命等历史时期上海报业的发展。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④述及近代报业创始至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报业发展情况,《上海新报》、《万国公报》、《申报》、《时务报》和《神州日报》等多种近代报刊皆有涉及。

报人研究可分为报人群体和报人个案两类。前者如程丽红的《清代报人研究》揭示了清代报人“从专制皇权掌控下解放的过程,以及从封建伦理观中游离,走向近代化的心灵轨迹的同时,对清代报人在中国报业近代化的构建与开拓作用,对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作为、贡献及应有的地位等做出了准确的评判”^⑤。报人论政是学界研究报人群体切入较多的视阈之一。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⑥将知识分子与报刊结合起来,以《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益世报》和《观察》等著名报刊为个案,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运动等有关思想史、政治史和新闻史的一些问题。袁新洁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⑦分“发轫”、“承启”、“发展”、“高潮”和“尾声”五期,研究了报刊文人对维新与抗日救

① 分别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分别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

④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封底。

⑥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 袁新洁:《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亡等重大事件的表现及原因。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①将报人分为职业报人、政治家报人、小说家报人与报业老板数类，回顾和论述了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与收入、日常生活与交往等方面的情形。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报业团体也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之一。赵建国在《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②一文中认为甲午战争前报纸社会影响力的局限，造成了报人的“边缘”化。随着报业的发展，报纸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报人逐渐走向社会“中心”，表现为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同业组织的创建和维护报界权益的活动等诸方面。刘磊的《中国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进》^③简述了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由低到高转变的过程，作者认为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刊作用终为社会所认知。赵建国的《清末民初的上海日报公会》^④一文，梳理了上海日报公会创建、活动与交往和上海报界名誉风波的过程，指出该会的成立是上海报界群体意识日益自觉的显例。赵建国在《中国报界俱进会与近代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⑤一文中指出，1910年，一些主要报馆在南京组织成立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报界团体——中国报界俱进会，及此后北京会议、上海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各项议案，体现了报界结社的发展趋势和群体意识的日益自觉。

学界对报人个案的研究多集中于报界名人。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报人时代”丛书，包括王润泽著《张季鸾与〈大公报〉》，杨雪梅著

① 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② 赵建国：《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③ 刘磊：《中国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进》，《传媒》，2002年第7期。

④ 赵建国：《清末民初的上海日报公会》，《探索》，2006年4期。

⑤ 赵建国：《中国报界俱进会与近代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新闻大学》，2007年4期。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林溪声、张耐冬著《邵飘萍与〈京报〉》三册。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自然为研究热点人物之一，专著有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①、周仕荣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与〈新民丛报〉》^②等，前者在梳理梁启超经营报业背景与报业概况基础上，研究了他的报业思想、对报业的贡献和言论影响；后者则考察了《新民丛报》刊行情况，梁氏的政治思想及转变因由。学位论文有李新丽的《中国近代报刊与人的现代化——以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为考察对象（1896—1907）》^③，考察了20世纪之交，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活动在提升人的现代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有关梁氏的学术论文更有数十篇之多，涉及他主编（主笔）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清议报》等主要报纸。有关汪康年的研究有许莹的《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④介绍了汪氏办报经历、译报观与实践、新闻报道观与实践、政论观与实践，分析了“独立独特”的原因。其他的诸如于右任、王芸生、林白水、储安平、陈范、蔡尔康、吴双热、王韬、范介卿等报人都有专文讨论。

本书即在上述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考量该群体在议政论政、教育和实业的社会参与等诸方面的表现，探讨其于近代社会转型之际，面临自我谋生的压力和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在构建公共舆论、参与社会事务等方面的作为。同时考察苏籍报人职业生活状况，及其生产消费文化的情形，梳理该群体的生活面貌，探讨其职业认同，以期丰富近代报人问题的研究。

① 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② 周仕荣：《言论界骄子：梁启超与〈新民丛报〉》，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③ 李新丽：《中国近代报刊与人的现代化——以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为考察对象（1896—1907）》，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许莹：《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三、相关资料说明

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的言论主张,散见于报人主编或编辑的各种报刊,如《万国公报》、《译书汇编》、《循环日报》、《时报》、《申报》、《觉民》、《江苏》、《民报》、《农学报》、《教育世界》、《妇女时报》等,报刊的发刊词、报人撰写的社论、时评及新闻报道等,构成了研究苏籍报人群体的重要原始资料。

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版的多种报刊影印本或资料集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主要有姜亚沙等《晚清珍稀期刊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收录的《中西闻见录》、《清议报》和《上海新报》等,罗家伦《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收录的《江苏》、《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游学译编》和《国民日报汇编》等。

各种出版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资料,如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系列、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宋应离等《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教学参考资料》、王文彬编著《中国现代报刊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新闻史和新闻研究资料也可供本书使用,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的《新闻研究资料》(第1—48辑,出版时间不一)、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有关旧上海及旧报刊资料,如《旧上海史料汇编》(上海通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